

端士習與正學風

——重讀蔡元培

● 胡 成

民國初年，恐怕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和墮落的時代，且不說滿清崩塌之後屢屢出現的戰亂頻仍和政象不寧，就以學術而論，也是士風日下，奄奄而無生氣。時人以當時的出版物言之^①：

向者出版冊籍，日新月異雖漫無系統，徒以稗販為能，別類分門，尚能各有進步；今則猥詩褻淫靡之書，盈目皆是。或摭拾巷里無稽瑣談，或剽襲報間燦爛記載，屢以游詞，飾之艷語，甚且悖備蔑理，恣言瀆亂家庭之風，積非成是，遂至淫靡之書，亦必揚言猥穢，冀得銷售，以此論之，則增一新書，即多一誘惑青年陷溺社會之蠱賊，尚何有學術足云。

士風的淪喪所來有自，「私德不修，禍及社會」，這個時代的百政俱廢，風紀蕩然當然是其衰朽政治所致。在滿清覆亡之後，袁世凱政府「收買議員，運動帝制，攫全國之公款，用之如泥沙，無所顧惜，則狂賭狂嫖，一方面驅於微倖之心，一方面且用於鑽營之術。謬種流傳，迄今未已」^②。風氣波及士林，其「篤舊之士，但知愁怨牢騷，不復為社會盡

力；而新學者則十五之六，捲入政治渦漩，日奔走於達官武夫之側，暇且放浪形骸，縱情歌舞，……更何論淪新政，啟後進！」^③可見，文人無德無行與官吏的驕慢顛預，政客的陰險奸詐，武人的專橫誤國之間存在着密切的共生關係。

在這功利所在，學人爭趨形勢之途，闖然媚世和風化沉淪之際，歷史的真精神恰在於還有那麼一批弘毅狷潔、剛直介特之士，願與文化精神「共命而同盡」(陳寅恪先生語)。但倘若就明道淑人之心，撥亂反正之事而言之，蔡元培先生無疑是此中最高卓之士。或許因為，這個時代的卑污和衰頹給他太多的震驚和憤慨，他曾寫有^④：

往昔昏濁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與敝俗奮鬥，如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學，明季之東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而今則眾濁獨清之士，亦且踽踽獨行，不敢集同志以矯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現象也！

蔡元培先生在這昏濁之世保持了私德之淳淨，歷史也留下很多有關他如何砥節勵行，貶斥勢力的感人記

載。他先後任過三年的部長和大學院院長，十年的大學校長和國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卻沒為自己殖片瓦私產。他上海的住房還是朋友和學生們在看不過去的情況下，湊款購贈。他逝世時除了幾千冊圖書外毫無金錢積蓄，喪葬費用乃為朋友接濟和政府補助。在他傳奇般的生涯中，最值得濃墨重彩的，當是其致力於在這昏濁之世端士習，正學風，挽狂瀾於既倒之際的宏大精神。具體言之，這即是蔡先生重塑知識尊嚴的努力。在他看來，「我國近年所以士風日敝，民俗日偷者，其原因固甚複雜，而學術銷沉，實為其重要之一因。教者以沿襲塞責，而不知求新知；學者以資格為的，而不重心得。在教育界已奄奄無氣如此，又安望其影響及於一般社會乎？」^⑤因此，士習之不端，乃由於學風不正；學風之不正，又在於知識沒有尊嚴。而知識沒有尊嚴在當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知識神聖的殿堂被視為競爭的名利場，教師沒有教的熱情，學生沒有學的興趣。如當時的北大，學生期求的只是學習期滿後，得到一張文憑。而教員則又不用功，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雜書，下課時，再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等到學期、常年或畢業的考試再拿出來讀。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地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試題，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就得到了一種

保障^⑥。難怪當時的北大，被人譏諷為探艷團也，賭窟也，捧坤角也，浮艷劇評花叢策源地也。

二是學校管理中強烈的反智傾向，教師在學校裏沒有地位，校務為官僚壟斷，極盡操縱傾軋之能事。從獨裁者的個人秉性來看，執政袁世凱一向認為天下無難事，惟有金錢能達到目的。而縱觀袁氏一生，他能「處政海潮流中，事事能着先鞭者，固由於手腕敏活，其大半亦依賴黃金勢力也」^⑦。所以，袁氏最討厭知識份子。時人記載，在清末，投奔到袁世凱門下的各路英雄約有千人之多。但除阮忠樞、梁士詒外，袁氏一概不用讀書人。在他看來，下屬只須堅決執行他的意志，不要通權達變。因此，每當有士人來投，即給月薪十金，置之閒散，並將此稱謂「豢豚」，以致有人來了數年還沒有見過他一面。一些耐不住終日無所事事，或稍有節介之氣的士人，請求告辭，袁必視路程遠近給予相當的資助，但同時要在帳上記道：某日斬一豚^⑧。而就制度本身來說，民初教育沿襲的又是滿清舊制，以長官負責。儘管民國元年頒布有大學校令，規定大學可以設置教授會，但並未明確教授會有參與學校決策和管理的權力，各大學也多無教授會，所以蔡先生寫有：「我初到北京大學，就知道以前的辦法，是一切學務都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少數人辦理，並學長也沒有與聞的。」^⑨

於是，蔡元培執長北大之後，即全力重塑知識的尊嚴。首先他強調，學校應以學術研究為其根本。他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⑩主張大學就是純為研究學問之機關，而

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與之相應的，是學者當亦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在和周春君有關大學性質的討論中，他更明確地區分了「學」與「術」的不同。他說：「鄙人以為治學者可以謂之『大學』：治術者可以為之『高等專門學校』，在大學則必擇其以終身研究學問者為之師，而希望學生於研究學問之外，別無何等之目的。」所以，當時北大學制改革圍繞的即是蔡先生「以學為基本，術為支幹」，學應重於術的基本方針^①。

其次，蔡先生提倡切實確立教授治校的原則。德國大學的管理體制曾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說^②：

德國革命以前是很專制的，但是他們大學是極端的平民主義。他的校長與各科的學長，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會公舉的。他的校長，由四科（神學、醫學、法學、哲學）教授迭任……周而復始，照此遞推。諸君試想：一科的教授，當然與他科的學生很少關係；至於神學科教授，尤為他科的學生所討厭的；但他們按年輪舉，全校學生從沒有為校長發生問題的。

所以，在其接任北大校長之初，即組織評議會，給教授以學校代表，議決立法方面的權利：恢復學長的權限，給他們以分任行政的權利。鑒於校長與學長仍是少數，蔡元培先生又組織各門學科的教授會，由各教授與所公舉的教授會主任分任教務。所以，教師在學校實握最高之決定權。

更重要的是，知識活動原本是以真理的追求和把握為其終極目標的，人們只有在這裏才能真正領略到深藏

在宇宙之中無限的和諧和完美，因而知識活動即為人類最高的尊嚴。大學既然為研究學問的機構，知識的尊嚴就體現在其特有的價值準則和評估尺度上，是非善惡的判別就不能為任何學術之外的動機所左右，同時也不應在任何壓力面前唯唯諾諾，屈從聽命。因此，蔡元培先生自有其風骨嶙峋的一面，即在學術方面恪守「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原則，堅持學術的分歧應由學術的爭論來解決，因為知識有着最高的尊嚴！

所以，他堅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③：

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而當一些穩健懷舊之士對《新青年》諸君的不滿甚囂塵上之時，他辯解道^④：

對於教師，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主張為界限（「思想自由」）。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辯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惻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

這同樣又體現在對學者學術水平的判別上——以學術為準，不唯名是舉，尤其不挾洋人以自重。他初到北大，即發現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託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而來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北大既久，目睹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着闌珊起來。蔡元培先生辭退了幾個，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他，另一英國教員竟讓英國公使朱爾典同蔡元培先生談判，他還是不肯答應，以致這位公使先生憤憤威脅：「蔡元培是不要做校長的了。」^⑮而對確有真才實學的，他又不拘一格聘請到北大。如陳獨秀，就是趁陳來北京為群益書局招股，他親往其下榻的旅館延攬而來；梁漱溟則是考北大未被錄取，但在他讀到其研究印度哲學的一篇論文後，竟親自寫信給這位26歲的年輕人，請他來任教。

正如陳寅恪先生有「天其廢我是耶非」的慨嘆，蔡元培先生同樣面臨着「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深刻窘境。畢竟，這是一多災多難、禮崩樂圯的時代。而中國歷史早有屢屢被證明了的規律：每當社會鮮廉寡恥之際，即為禍亂動盪到來之時，近代中國尤其如此。恰如龔自珍〈尊隱〉篇中的痛切告誡：「燈燭無光，不聞餘言，但聞鼙聲。夜之漫漫，鷄旦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⑯逮至1919年，革命的暴風驟雨紛至沓來，然蔡先生卻仍在那裏苦苦倡揚「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成為最高文化中心」，並竭力反對學生參加各種政治運動。在他看來，「學生在學校裏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

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更耐人尋味的是，在為當今史家譽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開端」的1919年5月4日那天，他竟站在北大門口，聲嘶力竭地苦勸學生們不要上街遊行。而當學生一意孤行，他即決定引咎辭職^⑰。

並非蔡先生怯懦，也不是他已沒有了參政的熱情而認同於那衰朽的政治，曾為職業革命家的蔡元培先生也有過那激勵亢奮的時代和出生入死的經歷。與同時代那些一文不名的窮學生不一樣，他「在科場告捷，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之後，循着一般封建士大夫的道路走下去，完全有可能躋身於達官顯宦的先列」^⑱。但他終為國勢日危，民生益蹙所感，於1902年投身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且態度十分激進，甚至主張「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但在此時，他已深切體會到人格自立，政治清明，求之於學術。學術養成一貫，風氣自然丕變，知識自有其最高的價值和尊嚴。所以，「五四」風潮平息之後，他告誡北大學生說^⑲：

諸君自五月四日以來，為喚醒全國國民愛國心起見，不惜犧牲神聖之學術以從事於救國之運動。全國國民，既動於諸君之熱誠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盡其一分子之責任；即當局亦了然於愛國心之可救國，而容納國民之要求。在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若令為永久之覺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尚其志趣，純潔其品性，必難俸致。……則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也。

無奈，他對未來寄予了太多的希望。早在到北大後和學生們的第一次談話中，他即說^⑳：

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

所以，儘管蔡元培先生竭力反對學生參加政治運動，但他卻完全理解學生的滿腔熱忱，並對他們「與汝偕亡」的犧牲予以深切的同情。他說，學生之所以犧牲其求學之時間與心力，而從事於普通國民之業務，是「迫於愛國之心，不得已也。向使學生而外之國民，均能愛國，而盡力於救國之事業，為使學生者專心求學，學成而後有以大效於國，誠學生之幸也。而我國大多數之國民，方漠然於吾國之安危，若與己無關。而一部分有力者，乃日以椽喪國家為務。其能知國家主義而竭誠以保護之者，至少數耳。求能助此少數愛國家，喚醒無意識之大多數國民，而抵制椽喪國家之行為，非學生而誰？」^②因此，歷史載有：「五四」大批學生被無理拘捕，他竟向當局表示願以一人抵罪，以保出被捕學生；而當被捕學生放出返校，他又親率北大全體教職員在漢花園經紅樓前面的廣場上迎接，只見他「含着眼淚，強作笑容」。然而此時此刻，他內心的巨大痛楚，其中所蘊涵着的深刻歷史容量，也許只有到了今天，在我們經歷了眾多的苦難之後，方能多少有點理解。

註釋

- ①③ 李浩然：〈新舊文學之衝突〉，載《東方雜誌》，第十六卷，第九號（民國八年九月）。
- ②④ 〈北京大學進德會旨趣書〉，載《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三號。
- ⑤ 《北京大學日刊》，第八三號。
- ⑥⑬⑮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自述》（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頁12；13；13。
- ⑦ 《袁世凱軼事》（上海藝文社，1906），頁54。
- ⑧ 《袁世凱軼事續錄》，卷三（上海藝文社，1906），頁18。
- ⑨⑫ 〈回任北京大學校長在全體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說詞〉，《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341-42。
- ⑩⑲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5-7。
- ⑪ 蔡元培：〈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載《新青年》，第4卷，第5號（1918年5月15日）。
- ⑭ 〈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67-72。
- ⑯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頁88。
- ⑰ 《蔡元培自述》，頁28。
- ⑱ 周天度：《蔡元培傳》（人民出版社，1984），頁6。
- ⑲ 〈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書〉，《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312-13。
- ⑳ 〈國民雜誌序〉，《蔡元培先生遺文類鈔》，孫德中編（台北：復興書局，1961），頁493。

胡成 1954年生，1986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獲碩士學位。現任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